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邢義田 黃寬重 鄧小南 總主編

陳弱水 王汎森 主編

思想與學術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思想與學術

陳弱水 王汎森 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總編輯:徐惟誠

社 長:田勝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思想與學術/陳弱水,王汎森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4/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ISBN 7-5000-7286-4

I. 思... II. ①陳... ②王... III. 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文集 IV. B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8309 號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阜成門北大街 17 號 郵政編碼:100037 電話:010-68315609)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市智力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635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張:23 字數:353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冊

ISBN 7-5000-7286-4/K·454

定價:4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與出版社聯系調換。

出版說明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是數十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代表性著述的匯編。叢書共分十三個專題，多角度多層面地反映海峽對岸中國史學的豐碩成果，如此大規模推介，在大陸尚屬首次。

叢書充分尊重臺灣學者的觀點、表達習慣和文字用法，凡不引起歧義之處，都儘可能遵照原稿。作者觀點與大陸主流觀點不同之處，請讀者審別。由於出版年代、刊物、背景不同，各篇論文體例不盡相同，所以本叢書在格式上未強求統一，以保持原作最初發表時的風貌。各篇論文之后都附有該論文的原刊信息和作者小傳，以便讀者檢索。

在用字方面，既尊重原作者的用法，又充分考慮到海峽兩岸不同的用字和用詞習慣，對原稿用字不一致的情況進行了一些處理。

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指正。

論叢編委會

2005年3月

總序

邢義田

爲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臺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臺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爲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臺灣學者的或在臺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複收入。爲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爲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爲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前期出版者爲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餘年的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臺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爲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臺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1] 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 1949 年前後來臺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臺灣的學術園地如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原稱師範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2] 從 1949 到 1987 年解除戒嚴，臺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臺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臺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詒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裏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3] 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臺灣，生活艱

[1] 可參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年；張玉法《臺灣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1994），頁47～76。

[2]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臺灣唯一一所高等學府是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收復後，日籍研究人員離臺，仍在臺大的教員有楊雲萍、曹永和、徐先堯等少數人。但他們的研究此後並沒有成為主導的力量。請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年，頁3。

[3] 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頁6。

困，爲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爲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鉅訂補注；或遠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臺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繫。新生的一代同樣爲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臺，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臺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爲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爲建立理論立下更爲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臺灣恢復出刊，成爲臺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爲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L. V. 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爲臺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係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實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臺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4〕}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臺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佈，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入。以臺大爲例，

〔4〕 參張玉法，前引文，頁76。

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啓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入書庫，複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 L. 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 A. 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瑟（J. 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哈（Wolfram 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誌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爲主的《思與言》雜誌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爲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儘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莊，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爲之擺蕩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誌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衝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臺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蕩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臺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爲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爲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臺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臺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係。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

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和法國年鉴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鉴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鉴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臺，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櫟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臺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5〕}

曾影響臺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裏說：“回顧五十年來臺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6〕}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2004年12月

〔5〕 請參本叢書《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彭明輝所寫《導論：方法、方法論與歷史解釋》；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

〔6〕 許倬雲《錦瑟無端五十弦——憶臺灣半世紀的史學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頁14。

導 言

陳弱水 王汎森

本書收錄了十四篇在過去幾十年間發表於臺灣的中國思想史論文。在開始介紹本書的內容和編選考慮之前，要先對中國思想史研究在臺灣發展的情況稍作說明，以方便讀者瞭解本選集的性質。整體上來說，思想史是臺灣歷史學很有特色的一個領域。在過去半個世紀的臺灣，思想史學者不算多，除了七八十年代一段短暫的時期，研究也並不特別顯得蓬勃，不過，這個領域長期在臺灣歷史學界存在而且一直具有活力的事實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了。195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專業歷史學者關注或研究思想的很少，思想歷史的探索，基本上是哲學和中文學界出身的學者所從事的。在另一個具有中國文史研究傳統的地方——日本，情況也是如此，歷史學者對思想問題少有問津。於是，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傳統的漢字文化圈裏，只有臺灣歷史學界對思想史保持關注，這是臺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具有特色和顯著成果的基本背景。

顧名思義，思想史可以包括對於歷史上一切思想現象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存在於人文與社會研究中的許多學科。由於訓練與專業眼光使然，歷史學者研究思想，觀察的眼界往往比較廣闊，會注意到零散不成體系的觀念或沒有明確表露的集體意識，觀念和具體歷史環境的關係，尤其是考察的重點；另一方面，對於哲學和其他專門學術課題，有時則不如其他行道的學者精到。以上所說，只是大概的情況，歷史學訓練出身的思想史家，也有以學術思想的內在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反之，中文、哲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敏於歷史觀察的，也大有人在。本書收選論文，並不考慮作者的出身學科，但多少會顧及研究取向是否接近於常識上所說的思想史，以免內容駁雜，為例不純。無論如何，在臺灣的思想史研究中，歷史學者是重要力量終究是個突出的現象，值得先行向讀者說明。

大抵來說，臺灣的思想史研究存在著兩個傳統，一是具有傳統

背景的學術史，另一是西方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前者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延伸，後者則特別是 1970 年代以後，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英語史學影響而興盛的。後面的一項因素，是臺灣歷史學界具有思想史研究傳統的關鍵原因。本選集中，來自這兩個傳統的論文都有，但讀者應該也能發現，兩者並不能截然劃分。學者處於具有兩個傳統的學術氛圍，兼受沾溉，毋寧是很自然的。

本書的論文，是編者兼顧多種因素所選收的，並沒有事先預定的嚴格準則，但有兩個通盤的考慮值得一提。首先，本書具有類似通史的結構，涵括了戰國以下中國思想史的全部，每個重要斷代都有文章收入。不過，這些作品貫串起來，並不能構成首尾完整的知識或論述，只能說，每個時代都有值得參考的論文作為代表。其次，編者希望本書能夠反映臺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特色。這個問題有些複雜，需要略作引申。

從一個學術領域半世紀的成果中編選論文集，很難有面面俱到的作法。一個很容易想見的方式是，挑出一些精嚴、能代表目前最尖端成果的論文。但問題是，學問之事猶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真正經典性的作品為數有限，作為實證學科的歷史學尤其如此，如果僅以是否能顯示最前沿的研究狀況為考慮，這樣的論文集可能也容易過時。本書所採取是另一種途徑，就是以論文的特色為著眼點，希望收入的是能在選題、方法或某些論點上予人啟發的作品。本書還面臨著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讀者是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編選的工作因之須特別考慮切合大陸學界的著作。本書中的有些文章，就全世界漢學研究的範圍而言，論點或研究取徑已經不能算是新穎，但因在大陸還不常見，透過中文文字的親近性，或許還能對大陸學界發生攻錯切磋的作用。此外，本書的編選還多少考慮學者背景、撰作年代、研究風格的平衡，希望反映臺灣思想史研究比較完整的面貌，甚至能提供一點學術史的角度。

本書的編選工作，由王汎森、陳弱水兩位擔任。陳弱水負責宋元以前的部分，王汎森負責其後。論集內容的具體介紹，也是分前後部，由兩位編者分別撰寫。

—

跟本書中有關明清以後的論文相比，宋元以前的部分傳統學術

的色彩比較強。這部分的作者群中，在西方受過完整歷史學研究生教育的只有兩位。另外一位陳芳明先生，雖然曾在美國的大學就讀歷史學博士班，但所收論文是出國前寫的。不過，臺灣的學術環境與195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有重大的差別，即使是不具明顯西方色彩的研究，也經常呈現著異於大陸學界的面貌。以下就對本書前半部的論文及其相關問題略作介紹。

本書的第一篇文章是黃俊傑先生的《孟子後學對身心關係的看法——以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為中心》。近二十多年，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又起熱潮，最大的動力就是新出的簡帛佚籍，尤其以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和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簡最為重要。臺灣學者利用新出文書從事研究的，所在多有，黃先生的文章也在其列。

黃先生此文原刊於1990年臺灣《清華學報》新20卷1期，結合《五行篇》與傳世典籍探討孟子後學對身心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有關“心”的思想的新發展。這是一篇頗能反映臺灣思想史研究風格的作品，它博採國際已有的相關成果，考慮、評估其他學者已提出的看法，並特別重視觀念的分析。近十多年來，以古代簡帛為中心的研究還不斷在進展中，新出論著源源不絕，但無論作為臺灣思想史學的代表或先秦儒學研究的成果，本文應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戴君仁先生的《董仲舒不說五行考》是本書的最早期作品之一，原發表於1968年出版的《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卷1期。這也是本書中唯一的考證文字。選入此文的原因是，這篇文章涉及了漢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不知為什麼，這個問題在當代中文學界卻很少引起重視。戴先生此文的論點是，《春秋繁露》很大部分不是董仲舒所撰，主要理由是，在傳世資料可確定為董仲舒的學說中，只見其論陰陽，不見五行，而《春秋繁露》中卻有大量的五行論說。董仲舒是漢代思想史的關鍵人物，《春秋繁露》是最重要的漢代傳世典籍之一，董仲舒與此書的關係可能有疑竇，宋代以後就有人提出，是學術史上的老案，海外學者對此案的關心也一直持續。然而，一直到最近，中文漢代思想史的著作一般還是直接把《春秋繁露》的全部內容當作董仲舒的著作，把此書視為他的思想的材料，完全不加考索。現在重刊此文，也許可以讓相關專家重新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對《春秋繁露》作更通透的研究。

漢代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儒教正統形成的時代，還有其他對後世深具影響的發展，重要性之高不言可喻，但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似乎有些沉寂。依照編者外行的看法，其中應該還有不少精細的工作可做，即使像《春秋繁露》這樣的基本文獻，也還有重大的疑問待決。學者似乎不宜視而不見，只滿足於一般性的思想解釋。

林麗真先生的《論魏晉的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廣泛探討孝道問題在魏晉思想上的表現。魏晉思想的突破性變化在於玄學與玄風的興起。玄學主張“天地萬物以無爲本”，玄風崇尚自然，既企圖建立超越儒家名教的形上本體，又對傳統禮法有所批判破壞。可是，儒家的價值體系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淵源，其基礎不是少數上層士大夫的思想所能撼動的，特別是“孝”，魏晉以後，由於種種因緣，不但受到尊崇的程度有增無減——甚至到達宗教的層次，而且有愈益向社會一般人群蔓延的趨勢。林先生的論文主旨在觀察，在魏晉新思潮的環境裏，對於孝道的問題有哪些討論，這些討論的意義何在。就魏晉思想的研究而言，此文的特點是，藉著描述一個傳統的根本價值在魏晉時代所被激發的疑難和議論，來顯示當時思想的多重脈流。這種方式的研究，有時比直接深探玄學問題，更能揭露魏晉思想的整體構造，也顯示出思想史研究取向的特長所在。

羅聯添先生的《論唐代古文運動》，討論有關中唐古文風潮的四個問題。羅先生是文學史專家，他透過長期對唐代文學思想的研究，在本文提出了深具思想史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早有學者觸及，有的可能算是羅先生孤明先發，但在本文發表之後（1984、1989），已有很多的深入探討。但由於其中有些問題似乎還未獲得大陸學界的足夠重視，而且本文一舉涉及數個重要課題，在此重刊，希望能提供大陸同行參考。

羅先生此文的第一個問題是，“古文”一詞在唐代的使用頻度、用法以及“古文運動”一詞的合理性，羅先生不認為“古文運動”是可以用來指示唐代中葉文學變化的恰當詞語。這個問題，最近十幾年頗有其他學者注意，如日本的小野四平和美國的 Peter Bol。這不是簡單的名稱之爭，而涉及了我們對安史之亂以後文學寫作與文學思想變化的性質的認識，而中晚唐以後的整體思想變遷又是由文

人帶動的，這個問題因此有思想史的重要性。此文又引申羅根澤先生《隋唐文學批評史》的舊說法，指出古文運動的參加者多北方人，這個問題和古文運動的社會基礎有關，也值得再加深考。總之，羅先生此文的特點是標示出中唐古文與當時思想變動的幾個連接點，此文較早出，海外後來有更精細的相關研究，也值得有興趣的讀者注意。

陳弱水的《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研究對象與羅先生之文多有重複，研究取徑則相當不同。這是一篇以唐宋之際思想變化為題旨的論文，文章先從柳宗元思想的分析出發，發現他也屬於提倡儒道的陣營，但與同時另一位大闡儒風的文壇巨子韓愈頗有差距。大致說來，柳宗元的思想傳統性格比較強，基本上只把儒家界定為規範現實生活的教誨，他尤其重視政治層面的儒道；另一方面，韓愈則把佛教、道教視為儒家的敵手，認為兩方是衝突絕不相容的。韓愈以儒道為人文世界中統合性的唯一原理，就中古思想史的背景而言，這樣的想法是一種世界觀層次的變化，為儒學後來在心性、形上論的發展開了路。在九世紀前半，韓愈雖然聲名勝過柳宗元，他的思想卻代表著少數的形態，柳宗元的思路反而接近大多數倡導儒家復興的文人。

陳弱水的論文雖然以柳宗元為具體研究對象，重點其實在闡釋他的思想的歷史涵義，所以對於以宗元為主的中唐新思潮與其前、其後的思想有何關係，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也觸及中國中古思想之一般性質的問題。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希望能為中晚唐以後思想大變化的緣由提出一個比較基本的說明。

陳芳明先生的《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從史學史的觀點試探宋代史學之一》與張元先生的《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主題一致，都是處理歷史思想的。宋元思想的發展，自然以理學的崛起與興盛最為大事因緣。不過，中文學界有關理學的論著實在太多，可謂汗牛充棟，在臺灣這方面的研究中，不易找出有代表性的單篇論文。幾經考慮，決定選錄兩篇探討史學思想的文章，作為臺灣宋元思想史研究的樣本，介紹給大陸學界。

陳芳明先生的作品綜論宋代的正統思想。正統論是宋代歷史思想很突出的特點，反映了宋代思想文化的許多方面，譬如說，史學

的發達，對於政治的道德性的強調，民族意識的強化。這篇文章避免了現代流行的以正統論為荒唐無益的觀點，用同情的眼光來研究正統思想。該文發現，北宋、南宋正統論的內容有些不同。前者是中國歷史思想中正統理論形成的關鍵時期，尤其以歐陽修為代表，他捨棄了過去五德終始的說法，注重實際的治亂之跡，正統的要件是能安定、統一天下。到了南宋，正統觀念更趨嚴格，如朱熹的《通鑑綱目》利用正統思想評歷代過往政權的道德地位，夷夏之辨的民族色彩也趨濃厚，對往後的正統論有很大影響。南宋正統論的發展，明顯反映了理學思想的壯大與南宋國家的處境。

張元先生的文章藉由討論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流露的對南宋胡寅《讀史管見》的看法，揭示宋元時代的兩種歷史觀。一種是由胡寅所代表的理學家或經學家式的歷史觀，不重視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彼此間的因果關係，對於史事只做個別的評斷。在這種觀點中，歷史沒有自身的意義，只是經義或義理的例證而已。馬端臨則不然，他試圖掌握歷史自身的演變，以及這些演變所能顯露出的律則，換言之，這是一種相信歷史經驗具有獨立意義的看法。但另一方面，馬端臨仍然是醇儒，對於古聖先賢的道理深信不疑，在這一點上，他又很欣賞胡寅的史論，在《文獻通考》中多引其書，只是不能同意胡氏的道理先行，凌空議論。胡、馬兩人的歷史觀似乎很能透露宋代以下中國思想的一些基本面貌。

以上介紹本書前半部的文章。就瞭解中國思想史的概況而言，它們其實是不足夠的，舉例而言，全書沒有任何有關廣義的儒家思想以外的論著。這是很大的缺憾，在宋代以前，特別是中古這一段，中國思想界的多元性很高，佛教、道教勢力尤盛。本書編選有此結果，固然是因為篇幅有限，難以多收文章，但在過去幾十年的臺灣，以佛道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不很理想，也是一個原因。這種情況的改善，還有待學界同仁共同努力。

二

現在轉至明清以後。在摘要介紹這部分的論文之前，要先談以下幾點。首先，與本書上半部作者的背景有些不同，這些文章的作者全都受過西方學術的訓練，其中有幾位還長期在美國工作，所以

從他們的著作中，常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史訓練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啓發性的，不是單純的繼承。西方的影響使得他們在選題、詮釋及論點的鋪陳等方面，與 1930 年代茁長的一批思想史家有所不同，也與一面摘鈔一面說解式的思想史論著有異。他們的論著多以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或詮釋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為主，用流行的話說，即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他們對變化性、歷程性的問題或現象的掌握比較深入；他們行文時，重視“論證”，重視組織，重視從四面八方來探討一個問題，同時也有比較清楚的“論旨”（thesis）像一條線般貫穿全文；他們在處理思想史問題時，常常放在心上的是某某現象“如何形成”、“為何可能”。

所謂西方的影響，還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面：第一當然是西方思想史、學術史或西方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二是西方史學、哲學、社會學甚至人類學的啓發。前者是直接的，後者是支持的。在 1960、1970 年代，臺灣的史學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很大，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至於 1970 年代以來的思想史熱潮，所吸收的西方養分非常多元，柯林烏（R. G. Collingwood）、韋伯（Max Weber）、博蘭尼（Michael Polanyi）、海耶克（F. A. Hayek）、佛格林（Eric Vogelin）、孔恩（Thomas Kuhn）、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傅柯（Michel Foucault）等名家都在這一串名單中。當時也有人反對這種進路（approach），我（王汎森）依稀記得一位很受敬重的師長對我說：“孟子之時根本沒有韋伯，不懂韋伯也一樣可以講孟子。”但是更有不少人認為：西方思想資源的照映，確實可以在一些關鍵之處發揮正面的作用。

第二，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幾位先生，與 1970 ~ 1980 年代臺灣思想史研究的勃興密切相關。在此之前，思想史研究固然早已有胡適、錢穆等人的典範，新儒家方面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的影響之下，思想史或哲學史當然不曾斷絕，不過，史學界的主流並不是思想史。我清楚記得在 1970 年代中期，當我個人還在臺灣大學讀書時，思想史正在崛起，整個氣氛已經在變，但是老師及同學中治思想學術史的人仍屬少數，這樣的情形到了 1980 年代已經改變。

第三，過去二十年臺灣的思想史研究有一種發展趨向，即愈來

愈傾向於與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結合，這種結合不是“上層建築”、“下層建築”式的，而是一種互為因緣式的關係。所以，與前代思想史家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不純粹是只就思想論思想，所使用的材料也不局限於幾部思想著作，而是廣泛地利用文集、書信、日記、筆記、小說等材料，涵蓋的範圍也逐漸擴及文化史的許多方面，如傳播、出版、商業等（儘管如此，論述的重點仍然是思想）。

第四，這些文章中，尤其屬於近代的部分，有很强的時代對話性。最近張灝先生在臺北出版了《時代的探索》一書，搜集了十五篇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論文，我個人覺得這個書名很扼要地揭露出這一代思想史學者的一個重要關懷：他們想探索他們所目擊的時代。

近代中國是一個激烈變動的時期，如何深入瞭解這些親身經歷的變化，成為他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關懷，當然，也影響了他們的學術研究——是什麼思想根源造成了這些巨大的變動？除了重建歷史之外，他們有時候還是參與者、批判者，想追問這一切困局的癥結所在，而同樣的癥結可能還頑強地持續到今天。

以上幾點，只是一些粗枝大葉的觀察，並不充分，希望能補充大陸學界朋友對臺灣過去二三十年思想史研究的認識。接著要簡單地說明選文及安排的理由。首先我必須強調，臺灣思想學術史方面的好文章非常多，絕對不是任何選集所可以囊括的。此書中的文章基本上是牽就時代順序，在每一個段落選一篇，有些段落文章很多，有些段落文章很少，所以可供選擇的樣本數量差距很大。此外，收在本書的文章，即使處理的是個別人物的，所關注的範圍常常溢出個人之外，所以讀者千萬不能期望看到像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或《宋明理學史》的篇章，也不能期待讀到劍橋中國史那種鳥瞰一個時代整體思想狀況的文字。

接著我想談談各篇文章的論點。這篇導論的功能決不是完整地介紹每篇文章的內容，但為了幫助閱讀，蜻蜓點水式的摘述仍是必要的。

陽明心學是明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大事因緣”，討論他的文章數目之多，恐怕和討論馬丁路德的文章不相上下。本書中朱鴻林先生的《〈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有英文及中文兩種版本，英文版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